

敦煌、云冈、龙门三大石窟“掌门人”洛阳论道

本报记者 赵永宏



“敦煌、云冈、龙门三大石窟艺术联展，是数字化带来的可能性。云冈石窟实施全面的石窟保护，朝着预防性保护方向发展。云冈石窟正在和高校联合推动‘云冈学’的研究工作，人才是关键。”10月20日下午，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云冈石窟研究院院长张焯、龙门石窟研究院院长史家珍参加“敦煌、云冈、龙门三大石窟研究院院长共话石窟保护研究学术沙龙”，三位院长围绕“石窟保护研究”展开了一场对话。其间，云冈石窟研究院院长张焯发表了上述观点。

石窟的保护和利用如何平衡？

“保护是第一位的。”“首先要保护好。”对话中，三位院长提到最

多的是“保护”。云冈石窟研究院院长张焯讲述了云冈的保护历程，“从最初解决稳定性问题，到解决环境问题、渗水问题，到今天走上了全面的石窟保护，朝着预防性保护方向发展。”

丝绸之路上的“璀璨明珠”敦煌的保护，一直以来备受关注。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介绍，经过几十年的探索，敦煌找到了保护和利用之间的协调，在保护好基础上，经过多年的科学调查得出一个承载量的数字上限，让游客分时有序参观，也保证了更好地观看体验。

事实上，保护和利用这二者之间的平衡并不容易，不过近年来数字化技术的应用，让许多难题迎刃而解。

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同样在云冈

开花结果。张焯说，现在通过数字化激光扫描、VR、3D打印，云冈一二十米的大洞窟，都可以实现等比例复制，并且可拆装，走向世界展览。与此同时，云冈正在规划一个多元文化组成的历史文化长廊，践行大保护理念。

从2003年开始，云冈石窟研究院与多家科研院所合作，利用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和多图像近景拍摄测量技术，同多项数据融合，把石窟的所有信息高精度完整地保存下来，用数字方式进行有效保护，让千年石窟在数字世界达到永生，达到永久保存、永续利用的目的。

敦煌研究院在保护和利用方面进行统筹规划，通过数字展示中心，让游客在进洞窟之前，对历史背景、艺术特点有一个大致了解，即使游客进洞窟看的时间很短，但理解得更快更深。由于敦煌的参观预约常常早早报满，考虑到游客需求，敦煌正在规划建设数字化展示中心二期工程。建设一个数字化的大型博物馆，用更新的手段呈现更多的内容，呈现无限丰富的敦煌壁画，包括不开放洞窟，同时仿真还原，让壁画故事里的动物和人物走出来，比如让九色鹿和观众互动。龙门石窟利用数字化技术虚拟修复了“龙门最美观音”残像，在百年之后再展芳容。龙门石窟流散佛首也首次实现“数字复位”，3D打印复制的佛首造像顺利安放在立佛残像上。

石窟保护研究工作面临哪些难题？

谈到未来的石窟保护研究工作，三位院长的关键词，不约而同地换成了“人才”。

“需要花力气建设文物研究和保护的科研队伍。”赵声良说，专业人才还是比较缺，因为历史的原因，文物单位普遍存在工资待遇低、人才队伍不强的情况，敦煌研究院的专业人才相对其他石窟还算多，但对工作需求来说仍远远不够。近年来正通过专题培训、加强与高校的合作等方式来培养人才。

目前，云冈石窟正在和高校联合推动“云冈学”的研究工作，人才也是张焯关心的话题，“云冈也担负着山西文物保护的责任，山西地上文物众多，但是维修保护工作远远不足，彩塑壁画修复等需要大量人才，现在也在通过设立文物修复中心等改变现状。”

史家珍也坦言，在学科能力建设、人才培养上，龙门石窟任务非常重，“我们的研究人员规模和敦煌相比差几十倍，未来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石窟联展有哪些看点？

此次三大石窟联展因为难得一见，被网友形容为“神仙合体”。

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说：“我们三大石窟早就应该做这样的联合展览，未来一定会继续做，而且可能不仅仅是这三座石窟，因为中国的石窟



非常多，特别是丝绸之路沿线，希望联合全国的石窟单位共同将中国的石窟艺术发扬光大。”

对话中，三位院长还分别当起“导游”，为大家推荐各自展厅的看点。

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说，敦煌厅的特色主要是壁画，数量庞大，细腻丰富，表现内容有经变画、佛教故事画、供养人画像、装饰图案等。敦煌莫高窟从公元4世纪到14世纪，持续1000年没有中断，每个时代的风格特色鲜明。尤其是唐代的大规模经变画，展现了一个佛国世界，里面有建筑、山水、人物等包罗万象，体现了中国古代绘画的巨大成就。

云冈石窟研究院院长张焯在院长沙龙中诚邀各地游客仔细品味千年石窟文化。他介绍道：云冈石窟最大的看点在于雕刻，云冈是公元5世纪诞生的一座伟大的艺术宝库，来自于犍陀

罗艺术，犍陀罗在今天的巴基斯坦北部，是中亚、古印度、希腊等不同文化的交融。北魏时期，佛教大量进入中国，犍陀罗文化飞越万水千山，在云冈石窟开花结果，成为中华雕塑艺术的巅峰之作。

龙门石窟研究院院长史家珍说，龙门石窟是佛教中国化的典范，代表了盛唐时期的最高艺术成就。龙门石窟历史厚重，这次展览展出了近年来考古新发掘出土的精美石刻艺术品，可以说是美不胜收。当然，现场展示的只是龙门石窟极小的一部分，欢迎观众来龙门石窟走走看看。

“把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好，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的殷切嘱托，也是我们的职责和使命所在。”张焯说，文物事业既要“守得住”，也要“活起来”，石窟寺文物“走出去”，传播的是中华民族千年传承的“金名片”。



数字化手段让文物活起来走出去

——访云冈石窟研究院院长张焯

“敦煌、云冈、龙门三大石窟艺术联展，是数字化带来的可能性。”10月20日，云冈石窟研究院院长张焯在接受河南日报采访时说，通过VR、3D打印等数字化手段呈现，可以让不可移动的石窟寺文物“活起来”“走出去”。

数字化是提升文物保护利用水平的重要基础手段之一。张焯说：

“从漫长的历史角度来看，已经1500岁的云冈石窟，风化乃至消失，似乎不可避免。数字重生，但对石窟寺来说，是非常现实甚至紧迫的议题。”

张焯介绍：“从2003年开始，我院与多家科研院所合作，利用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和多图像近景拍摄测量技术，同多项数据融合，把石

窟的所有信息高精度完整地保存下来，用数字方式保存下来，让他在数字世界达到永生，达到永久保存、永续利用的目的。”

“数字技术在文物保护领域的作用有很多，首先就是真正让文物‘活’起来，从洞窟复制3D打印到壁画的复制对于有残损的洞窟，利用老照片、通过最先进的数字技术，进

行数字虚拟修复，再现石窟艺术原貌”张焯说。

在张焯看来，数字化技术，除了能记录石窟的真实变化，还应该深入挖掘石窟寺造像的艺术价值，展现出真正的艺术之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如果有足够精细的数据保存并传承，注定消失的石窟将得到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永生。

“把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好，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的殷切嘱托，也是我们的职责和使命所在。”张焯说，文物事业既要“守得住”，也要“活起来”，石窟寺文物“走出去”，传播的是中华民族千年传承的“金名片”。

原载2020年10月21日《河南日报》

云冈石窟第3窟新发现铭文浅释(中)

员小中 王雁翔



进行过较大规模的修缮，据《金碑》记载：辽重熙十八年(1049)，母后再修；天庆十年(1120)，赐大字额；咸雍五年(1069)，禁山樵木，又差军巡守；寿昌五年(1099)，委转运使兼修；清宁六年(1060)，又委转运使兼修。金天会二年(1124)改拔河道，皇统三年至六年(1143-1146)，重修灵岩大阁九楹、门楼四所等。由以上记载可知，辽代官方对石窟修缮、关注长达半世纪，接近北魏开凿石窟的时间长度。金代改拔河道属官军行为，而皇统年间的修缮则属民间行为，王禀慧住持并化缘，费钱二万。

今天，从云冈石窟数次考古发掘情况看，窟前有多处辽金建筑遗迹，甚至向西在十里河对岸的鲁班窑也发现大规模辽代建筑。窟顶东、西有辽代寺院遗址、铸造场地。可见辽代在云冈进行过大规模的建设。而留下的字迹只有第13窟南壁一方小小的契丹官员家属修像记，其文字细小，刻在反映佛座前原来预留的铭石面上，反映出民间修像者对佛像的敬畏。上述“川州、贝州”等地名，同样细小隐蔽，同样显得稀有而珍贵。

二是“寺僧法义供 / 弟子马仁优 / 僧”。此处铭文位置在上述“川州张德”西侧，刻字兼隶楷之形。相对于其他几处单独姓名，这算是个二人(含)以上师徒小团队。“寺僧”二字点明，此处铭文出自本寺僧人。“寺”字

有两个含义，一指官署名，如大鸿胪寺等；二指佛教僧名，如白马寺等，这“寺”字笔者理解属于后一种，说明这时的武州山石窟前，至少第3窟前存在有寺院。云冈历史上北魏有“灵岩寺、通乐寺”，唐代有“僧寺、尼寺”，辽代更是有十所寺庙各具其名，金代复建有“灵岩大阁”，明清有“石佛古寺”。铭文中的寺说是哪个寺，实难定论。现存的北魏造像铭里，没有“寺僧”的提法，这种称呼在云冈出现估计是北魏之后才有。铭文中的“寺僧”二字为异体字，在历代书法中像此处“寺”字的写法少见，而“僧”字写法在楷书体和碑刻中多见。“法义”，作为名词，指法义道理，还可指以“法”结义的组织，类似于以“邑”结成的“邑义”。在北朝后期，以法结义的方式超越了以地区结义的方式，“法义”一词有取代“邑义”一词的倾向，如北魏正光四年(523)河南省偃师市《法义三十人造像记》、大魏孝昌三年(527年)济南历山《法义兄弟一百余人造像记》、北魏永熙三年(534)《法义兄弟等二百人造像记》、大魏武定二年(544)《王贰郎法义三百人造像记》等，这些造像记里，“法义”后面的人数就是这个“法义”组织的规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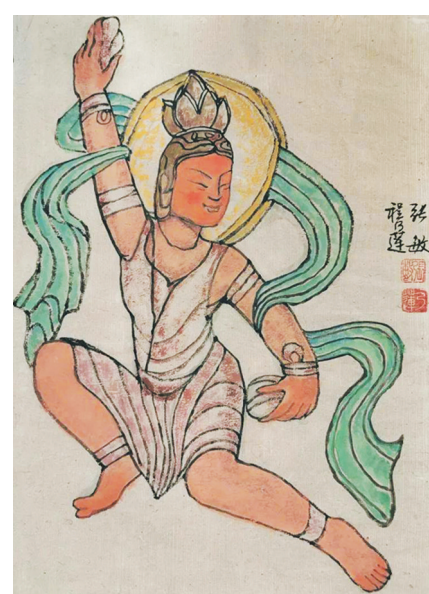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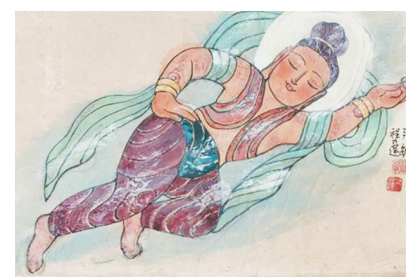
在此处，“法义”前边有“寺僧”，连起来理解就不是指佛法义理，后边既有“弟子”人名，也就不专指义团组织。笔者认为这里的“法义”指的是僧人的法号。“法”字辈的僧人在云冈比较少见，在第11窟太和七年(483)造像记旁边引导僧里有“邑师法宗”铭文。还有在北魏孝文帝时期帮助昙曜在武州山笔录佛经的南朝人刘峻，字孝标，本名法武。在《魏书·释老志》中，

法字辈的名僧也不足十人。再查阅明清现存云冈碑石，也没有法字辈僧人记录。这位铭刻为法义之名的僧人可能原本就是位普通僧人。

后一句“弟子”的“弟”是“弟”的异体字，古代同“弟”，而“弟”又通“弟”。“弟”的写法在隶书和碑刻中有例可寻，云冈北魏造像铭里“弟子”的写法在早期为“弟”(第20窟西壁)，晚期为“弟”(第5-1窟南壁)。“子”字刻于行外旁侧，概表示谦让。“弟子马”后面似有二字合在一起，分开上下是“仁”和“优”，如果是二字合一的，则难以辨认是何字，如分开两字就可能指的是马姓的两位弟子。以上异体字用法和个别字的处理方式表现出私刻铭文的随意性。

此铭刻上方有一小号的符号标记，意义不明，疑似定位标志，如果和前述“川州张德”下方的铁挂钩有关，那法义及其弟子可能就是悬挂铁钩并与之扩展作业有关的人。马姓弟子名字下边的“僧”字如连在一起读，甚不好理解，既是弟子就不便提僧，况前面有寺僧之僧。此处的“僧”如果与前句下边的“供”字联系起来作“供僧”，反倒是很容易理解，意指施舍财物供养僧人。从铭刻字迹上看，“供僧”二字似乎比其他字要粗壮有力，入石更深，并且与上边的字间距要大些。此铭刻是否有强调“供僧”两个字的意义？如果寺僧与弟子一起进行僧活动，并记录于此，是否意味着法义师徒在这里曾经进行过一场有纪念意义的宗教活动？场面或许大，人也可能多。而这个时候，不好确认。有供僧活动，起码有寺庙存在，有众僧存在，或许，寺庙里也有了佛像。

云冈石窟飞天(彩墨)



云冈石窟现存石刻造像59000多尊，其中飞天造像2400多身，飞天造像形式多样，风格独特。云冈石窟飞天整体呈现出体态丰硕，形象拙朴的艺术风貌。飞天造像由异国传入我国，经过我国工匠艺人丰富的想象和再创造，无论从艺术创作理念和艺术表现风格上，都深刻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意识。云冈石窟飞天展现的是独特的美。

云冈石窟有大量伎乐飞天，她们手持各种乐器，仿佛正在动情演奏。据考证，云冈石窟造像现存历代彩绘痕迹。石窟初开凿到完成时期到底有没有彩绘？云冈石窟为数不多的双飞

天，她们俩俩相随，盘旋飞舞，有的共擎摩花宝珠，有的合托莲花宝盒，有的对面细语，有的双手合十。她们那缓缓飞行的姿态，完美的形体，活泼的神情，无不显示出勃勃生机。程乃莲